

中国宏观经济 运行及其调控

袁志刚◎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JINGJIXINLUNWENCONG

● 经济新论文丛

0061 01

总 序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16个年头了。翻开世界近现代史，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内像中国那样取得经济高速的发展，11亿多人民的生活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重大突破的“三合一”成就呢？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生动证明，他的经济思想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胜利。

回顾社会主义走过的历程：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到部分承认部分否定；从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肯定有计划商品经济；从否定市场经济到肯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百多年漫长的认识历程啊！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和受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下降，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或衰落，社会主义的兴衰荣辱，无不与这个关键问题相联系。社会主义历史地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是唯一正确却又是艰难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不熟悉的一条新路。虽然已经确定它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我们没有认识或者还没有完全认识的东西还很多，随着实践的进展又会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公有产权如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有哪些涵义，怎样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怎样才能形成和规范化，清除种种非理性行为和权钱交易歪道；在复关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进一步开放，外贸外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和自由兑换都是

(沪)新登字 304 号

经济新论文丛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其调控

袁志刚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19,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429-0296-2/F·0284

定价: 8.50 元

有待解决的难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难免付出环境代价，关键又是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某种非均衡大概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中，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行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尤其显得重要，这又牵涉到一系列问题。总之，各种各样挑战性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出路在于学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只有通过学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不断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否则，就可能用老一套认识对待新事物。或者是，口头上说的是市场经济，行动上却搞计划经济；或者呢？把搞市场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只有掌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才有可能用新理论、新观念去认识和处理问题。

学习离不开研究，研究也是一种学习。研究贵在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造性事业中，创新尤其重要。市场经济历史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它创造了市场经济下如何经营管理企业、市场和全国经济的经验，这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学习的；我们要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接轨，不学习国际市场经济的规范更是寸步难移的。但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经济，我们总要力求避免和缩小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市场经济中的负效应，因此需要有创造性；不能照搬照抄外国。再有一层，我们是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大国与小国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是需要发挥创造的原因所在。最后，我们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客观上就是一件崭新的事，没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设计，能成功吗？就说都是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也莫不反映各自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而各具特色。

当然，创新有不同的层次，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提出新的观点和内容，有了新的论证和表达，是创新；运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说明中国的现实，找出解决的思路和途径，换句话说，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有新意，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我们正是从这些涵义上理解创新的，因此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经济新论文丛”。

“经济新论文丛”的作者，大多数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经济研究的博士，也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站的其他兄弟院校的博士或副教授。博士后流动站，顾名思义是已经取得本国或外国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经济学者，他们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他们基础厚实，学有专长，思想敏捷，勇于创新，努力为繁荣我国的经济学作贡献，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责。

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立信会计出版社又慷慨地提供出版条件，我欣然同意他们邀请我担任这套文丛的主编，并为之作了序。

伍柏麟

1994.9

前 言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以前，西方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宏观上的充分利用，因而不需要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意义上的经济调控被简化为四大平衡，即物资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因此它是政府计划的主要内容。当前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既带有原来计划经济的特征，又带有某些市场经济的特征，再加上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劳动资源的相对过剩这一特征，使得其运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如何揭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型，分析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便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由于其微观经济单位和金融系统的体制特征以及经济资源的结构性特征，有它特有的运行方式和调控方式。从体制特征来看，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机制既不同于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一，微观经济主体的成份复杂，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其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由于产权关系模糊还没有转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轨道上来，但同时大量的自负盈亏承担投资风险的非国有

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比重已相当可观;第二,微观经济主体所处的环境又是一个既有计划信号,又有市场信号(包括受计划干扰的市场信号)调节的错综复杂的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还很混乱,在此微观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供求行为和投资行为需要一一得到解剖,不能简单地加总。另外,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央银行还没有真正起到中央银行的作用,国有专业银行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产权关系不明晰,因此它们的行为也是不规范的。其次,由于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不分,使双轨体制下的货币运行更加复杂。从资源拥有的结构性特征来看,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劳动供给可以说是无限弹性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宏观经济问题。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在其他经济资源可利用的情况下尽量增加投资,发展生产,提高就业率。另外,劳动力资源的丰富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便宜,这个特点又成了国内投资和吸引外资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在这个经济中除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外,其他经济资源却很缺乏,尤其是基础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这些薄弱环节构成了限制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部门,因此经常性的结构制约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又一大特征。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如果不抓住这一关键特征,就不可能看清它的运行实质。在这些经济体制特征和资源拥有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研究了构成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的一对主要变量: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这样,不仅给出了这个宏观经济中总需求膨胀的体制原因,而且给出了总需求构成中各种成份的变动规律,为建立有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宏观经济是一个数量信号(计划信号和其他市场非均衡的数量制约信号)和价格信号交相作用的,劳动资源处于失业状态,由投资推动的总需求膨胀而最终又受制于其他经济资源约束

的非均衡运行的宏观经济。对这样一种宏观非均衡经济，笔者选择西方的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建立适合上述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模型，总结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非均衡状态，然后得出不同非均衡情况下如何运用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从模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对主要矛盾是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并存，因此本书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就失业问题来说，笔者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失业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解和描述，在此基础上探讨治理的政策措施。就通货膨胀问题来说，笔者对改革以来的四次经济周期中通货膨胀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根据这些实证材料，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引起通货膨胀的初始冲击原因和通货膨胀时期的反馈机制，在严密的理论推理基础上，对各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经济调控问题。笔者认为，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而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可以从微观、结构和宏观三个层次去考察。笔者讨论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三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调控的问题。

第二章着重讨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首先，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的体制特征；其次，分析了转轨时期的金融体制的特征；最后，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第三章在研究了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以后，着重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下和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

第四章研究了构成总需求的另一个主要变量——投资函数的

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尤其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波动的特殊性给予了充分的描述。

第五章介绍了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就宏观经济的调控来说，当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作用已不能保证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时，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非均衡的运行状态时，就需要政府作出某些数量调整，以减少宏观经济的非均衡程度。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为各种宏观经济非均衡状态的分析 and 调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第六章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根据第五章的方法论基础——非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建立了一个揭示转轨时期宏观经济非均衡运行的模型，该模型力图把中国经济中微观体制特征、结构性特征考虑进去，然后通过该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的非均衡状态，提出政府如何在不同的非均衡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减少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非均衡程度。

第七和第八两章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失业和通货膨胀独立出来进行研究。首先，讨论了失业理论和中国的失业问题，考察了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失业类型和生成原因；其次，考察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几次经济周期以及每次周期中的通货膨胀情况，然后提高到理论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反馈机制和政府调控的效果。

本书是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所作的博士后研究课题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该课题除了得到国家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的资助外，还得到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

1995.3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经济调控问题的提出	1
第一节 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经济资源配置优化问题	5
第二节 经济资源的结构性配置	9
第三节 经济资源的总量利用问题	22
第二章 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	30
第一节 微观经济体制问题是宏观总量失控的关键原因	30
第二节 体制转轨时期的金融体制特征	44
第三节 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50
第三章 中国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	60
第一节 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	60
第二节 传统体制下中国消费函数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	63
第三节 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函数	68
第四章 中国投资函数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	75
第一节 投资函数的一般形式	75
第二节 中国投资函数的形成特征	78
第五章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一个方法论基础	84
第一节 非均衡理论概述	84
第二节 非均衡理论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87
第三节 宏观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	91
第四节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实践意义	95
第六章 中国宏观经济非均衡运行及其调控模型	99
第一节 计划总供给和市场总供给	99

第二节	转轨时期总需求的形成·····	109
第三节	计划和市场混合经济中的均衡和非均衡·····	114
第七章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失业问题·····	120
第一节	几种主要失业理论与失业对策·····	120
第二节	我国当前失业现象的诸原因剖析·····	124
第三节	关于失业问题的几种对策思路·····	128
第八章	转轨时期的通货膨胀·····	132
第一节	改革以来四次经济周期中的通货膨胀·····	132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136
参考文献	·····	153

第一章 经济调控问题的提出

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历来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这些商品和服务主要是通过生产和交换来提供的。人类的需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生产创造了需要，需要最终要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如远古时代的人不可能产生拥有轿车的欲望。但是，需要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限于既有的经济资源和既定的技术水平，生产还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要，因此，如何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尽可能高水平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既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历来经济体制演变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在经济主体之间传递有关需求、可利用的资源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安排经济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以满足社会的各方面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信息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执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主要由计划指标来执行传导信息的功能。尽管在理论上，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都能圆满地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败”情况下，国家的调控是必不可少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证明，在现阶段，计划者还不可能充分拥有信息，同时也不可能解决被计划者的动力问题，因而还不是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模式。既然实践中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不能圆满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问

题，那么，就有必要探讨在何种情况下，这两种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出现功能失调，从而需要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对其进行调控。

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来揭示：

第一，微观经济层次，即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如何使其可支配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具体说来，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微观经济单位划分为两种：一是消费单位，我们把它称为家庭，二是生产单位，我们把它称为企业或厂商。就家庭来说，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指，假定某一家庭拥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源，如劳动要素、以前资金积累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资源，这是他们在每一时期获得收入的物质条件，同时家庭在取得收入以后就会对各种消费商品构成需求，并且可以用一个偏好函数来表达不同商品对他们的重要程度。因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就是决定出售多少他们拥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购买多少不同的消费品，从而使他们在既定的资源秉赋条件下达到最大的满足程度。所谓家庭达到最佳满足状态，是指家庭任何其他资源供给和消费品需求的组合方式都不可能再提高他们的满足程度。就一个企业来说，它的任务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各种生产要素，然后生产出某些特定的产品。因此，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生产过程要受到一定的技术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在短期内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是既定的，要想提高产量必须增加投入品。但是，关于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就比家庭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企业的目标函数。在一个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生产目标的企业中，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就是如何根据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价格，确定最佳的投入和产出组合，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在企业利润最大时，与这一特定的投入—产出的组合相比，任何其他投入和产出的组合都不可能再增加企业的利润。但是在一个金融指标不太重要的计划经济里，企业的生产目标是产量最大，所以这时的资源的优化配

置问题就是企业如何使用既定的投入品，使其产量最大。

第二，结构层次，即对一个社会经济来说，每种资源如何在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进行配置。结构层次上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衡量标准，是看资源的结构性配置是否符合社会偏好函数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结构安排下，最终产品是否正好满足各部门对投入品的需要和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要。因此，结构变动的根源在于社会最终需求的变化或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就是当社会最终需求或生产技术发生变化以后，可以迅速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例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最终需求的变化通过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引导资源的流向。当某一产品因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其价格上扬，该部门产品的价格上扬就会使该部门的企业获得高于其他部门企业利润的超额利润。这时一方面该部门中原有企业可以把利润转化为投资，扩大生产，但这只是一种流量调整；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把其他部门的资产转移到该部门，即通过存量调整的方式来扩大该部门的生产。因此，这个调整过程是通过企业为获得高额利润所进行的自觉选择而达到的，有着其内在的动力机制。但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因素的影响或者信息不完备的影响，价格变动并不能迅速地反映这种变化，因而结构调整也难免失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果计划者能够获得有关社会需求变化的信息和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的信息，那么，计划者也可以对资源的结构性安排作出改变。当然，这里还需要第二个假定，即被计划的企业愿意无条件地服从计划者制定的重新安排，否则在现实中就会出现结构难以调整的矛盾。在我们的实践中，不仅第一个假定是难以满足的，而且第二个假定的满足，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企业资产的转移还将涉及到企业领导人员的调动，职工的失业或重新安排等，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一项不考虑到参与者的切

身利益的计划调整也都是难以执行的。因此，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之，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都表现为某些部门的生产供过于求，而另外一些部门的生产求过于供，也就是说，经济资源在某些部门配置得太多，以致于浪费，而在另一些部门却严重短缺。在市场经济中，出现这一类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相对价格比率混乱，且某种非市场的力量（如垄断、人为干预等）阻止相对价格的调整。在计划经济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计划的失误，即计划信号不够准确，二是被计划者不愿执行计划者的命令。

第三，宏观层次，即经济资源总量的利用问题。在西方的古典经济学中，不存在宏观经济资源总体利用不足的问题。因为根据萨伊定律，个别市场有可能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但按照商品交换过程中供给同时构成需求的推理，整个经济的超额供给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西方社会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深重的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他证明了，在一个货币经济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已不可能在宏观上保证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需要政府在宏观上作出调整。至于在计划经济中，宏观经济调控问题则本来就是国家的事情，即由国家来决定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比率，如消费和投资的比率等等。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市场方式、计划方式以及这两种方式的不同程度的混合。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微观层次和结构层次上的资源优化配置是让给市场机制去完成的，当然政府根据其信息方面的优势可以制定一些产业政策，以引导产业的合理转化，而宏观层次上的调整则是由政府来作出的。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者的调控是全面的，除了家庭本身的资源配置以外，计划者的调控可以涉及微

观、结构和宏观各个层面的资源配置。

第一节 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 经济资源配置优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以价格信号的形式表示出来，某些物品越是稀缺或生产越是复杂，那么，该物品的价格就越高，反之价格就便宜。家庭以自己的效用函数（该函数表达各种商品与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并假定物品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① 和其所拥有的各种秉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经济资源）为基础，根据每个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信号，最终决定供给和需求的商品数量。这事实上是家庭在其收入约束（出售各种秉赋所得）和市场价格参数的约束之下，求解最优目标函数（效用函数）最大的一个最优规划。数学证明的结果表示，当家庭的效用达到最大时，各种商品给其带来的边际效用之比应该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否则，家庭就会继续改变所需求的商品组合，直到这个条件满足为止。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市场上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家庭就要重新安排他们所需求的消费品组合。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家庭对商品的需求就是相对价格的函数，即当一个商品的价格提高时，家庭的需求就会减少，价格降低需求就会增加，同时价格的升降又可以平衡每个市场的供求。由此可见，价格既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又是资源配置得到实现的手段。上述边际效用等值定律表达了家庭在其可支配资源的范围内，效用函数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也就是在家庭这个角度看，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

同样地，追求利润最大的理性生产者，在其生产函数（即技

^① 所谓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当人们消费某一物品的数量增加时，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物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

术条件)^①的约束下,根据由市场供求确定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出价格(这些相对价格是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需求强度的最好的信号),作出投入和产出的最佳组合。这同样是一个求解利润最大的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规划,其结果证明:只要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之比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那么,生产者就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否则,生产者就会继续调整投入和产出的组合,直到这一比率成立为止。边际等值定律保证了生产者在该资源配置方案上可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在企业的角度看资源得到了最优的配置。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就会引起企业投入和产出的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对投入品的需求和对产出品供给都是价格的函数,因此价格的变动平衡着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的供求。

只要市场机制是完善的,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信息是完备的,上述经济模型中的需求函数和生产函数满足某些数学推理上的条件,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是存在的,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行为而得到解决,用不着政府进行调控。因此,在一个市场机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不存在微观层次上的国家的经济调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要计划者能够获得有关社会偏好函数的信息、资源稀缺程度的信息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有关投入—产出系数的信息,如果被计划者能100%地执行计划者制定的这个计划,那么,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中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当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前提条件发生问题时,如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的扭曲、市场供求的非均衡、垄断市场的存在、计划者所拥有信息的不完备、被计划的生产者缺乏执行计划的内在动力,等等,就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①假定各投入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并且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